

毛
策／著

汉学范例

——
郑子瑜学术研究



毛
策／著

汉学范例

——
郑子瑜学术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学范例 / 毛策 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11

ISBN 7-5426-1998-5

I. 汉… II. 毛… III. 郑子瑜—汉学—学术思想—研究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470 号

汉学范例

著 者/ 毛 策

责任编辑/ 黄 韬

装帧设计/ 范峤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

ISBN7-5426-1998-5

C·70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前 言 走近大家的大家/1

第一章 郑子瑜与漳州传统文化/23

- 一 正气浩然的漳州文化传统对郑子瑜学术品格的影响/25
- 二 穷原竟委的漳州文化传统对郑子瑜学术操作的影响/31
- 三 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的漳州文化传统对郑子瑜开放学术眼界的影响/35

第二章 传统人文精神与科学品格——郑子瑜对黄遵宪的研究/41

- 一 “黄学”的首倡人/41
- 二 为黄遵宪定位/43
- 三 拓展研究空间，填补“黄学”空白/48
- 四 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链：黄遵宪与五四运动/50
- 五 搜辑中求真，考据中求实/53

第三章 旧途径、新精神：郑子瑜的郁达夫研究/60

- 一 郑子瑜心目中的郁达夫：挺着坚硬的穷骨/60
- 二 郁氏诗词的辑集/66
- 三 勾勒郁达夫诗词的发展轨迹/68

四 考据学的新成果/70

第四章 横刀直斩扶桑辔：郑子瑜的抗战诗文/76

- 一 直指咸阳杀暴秦/76
- 二 横刀直斩扶桑辔/80
- 三 彪炳千秋的华人抗日英雄/86

第五章 郑子瑜与日本学术界，兼论作为“实学”的 郑子瑜学术特征/89

- 一 批判创新的精神/91
- 二 经国济世/96
- 三 科学精神/97
- 四 考据学的新发展/100
- 五 中日学术的双向交流/100

第六章 学术梳理和学术创新/107

- 一 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及其他/109
- 二 只言片语的沙里淘金/115
- 三 修辞观念的明晰化/122
- 四 趋向理论化的发展期/128
- 五 诗歌修辞法的崛起/134
- 六 与前贤的睿智对话/140
- 七 师其意与师其形/153
- 八 中国修辞学的新开端/159

第七章 从《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到《中国修辞学史》—— 一件学术精品打磨的轨迹/165

- 一 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学术精神/165
- 二 由《变迁》而《史稿》：体系的确立和立论的严饬/167
- 三 由《史稿》而《学史》：填补缺漏、修正旧论/172

第八章 试为唐宋八大家修订议范文：《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的学术操作/182

- 一 “八大家”病辞无一幸免/182
- 二 《举要》操作层面初析/185

第九章 空谷足音：周氏兄弟研究/197

- 一 《〈阿Q正传〉郑笺》：鲁迅的海外知音/200
- 二 《鲁迅诗话》：鲁迅诗论的开创性成果/208
- 三 周氏兄弟诗作的比较研究/215

第十章 郑子瑜视野中的南洋学会中坚/223

- 一 郑子瑜与南洋学会/223
- 二 南洋学会鸟瞰/226
- 三 高维廉：大义凛然的银行家兼“黄学”专家/228
- 四 许云樵：以研究学术为职志的苦难学者/230
- 五 黄曼士：广结善缘的学界护花使者/233
- 六 刘士木：为学术而死的南洋问题专家/235
- 七 黄笃修：锦衣玉食之家的儒商文学家/237
- 八 陈育崧和韩槐准：学者从商，不忘于学/239

作者赘言/243

参考文献举要/245

前言

走近大家的大家

—

就我个人而言，走近郑子瑜是十分艰辛的。当《挑灯集》于199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我曾粗粗地浏览一过，这本散文集集杂感随笔、人物小志、散文游记和序跋书评于一身，读后令人怦然心动，它将我带入一种未曾体验也未曾经历的域外景观之中。虽以我的孤陋寡闻，当时仅仅从文学家这一角度来理解郑子瑜，但却是我走近郑子瑜的起点。我认识郑子瑜的经历与季羨林先生相反，季氏说：“最初我认为他只是个学者。现在读到了他的散文和杂感的结集，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个散文作家。”（《挑灯集》序）而且郑子瑜还是一位妙笔生花之大诗人。而我则是先认识到他是文学家，后来才弄清“庐山真面目”，原来他是在中国修辞学史、黄遵宪研究、周氏兄弟诗研究、郁达夫诗词研究以及先秦诸子研究等众多领域中均有重大建树的国际著名学者——“大家”。

我的学养浅薄，又生逢“文革”动乱，实在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对学者、名学者、大家之类以界定一位学人对人类及历史所作贡献的名称却是心中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的，也知道这三者是有质的区分的。“大家”除关心本专业之外，他的良知还驱使他对于民族以至对人类终极目标的关怀，他不仅仅献身于学术，还需以学术手段来关注民族及人类之前途，后者是前者的精神之延续，是一种无法释怀的、渗透于“大家”心理深层的自觉的人文关怀。

以上述标准来衡量郑子瑜，我觉得他无愧于“大家”的称号，且是“大家”的“大家”。要例证吗？随手可得。手头正有一份近年的香港《大公报》，报道了香港中文大学郑子瑜的学术论著自选集获选国家图书荣誉奖，并称他“成为首个大陆以外学者获此殊荣”者。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集》系列，除郑氏外，还包括冯友兰、冯至、任继愈、周谷城、季羨林、俞平伯、钟敬文、费孝通、梁漱溟等23位专家学者，他们难道不是当代的“大家”吗？

季羨林在《〈挑灯集〉序》中称其《中国修辞学史》是“皇皇巨作，前无古人”；“五四”时代的著名作家、已故的许杰先生也称《中国修辞学史》“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应该放入《马氏文通》、《修辞学发凡》一道，成为鼎足而三的巨作。”

张岱年在《郑子瑜学术演讲集》序中盛称其“学术渊博，成就宏卓”。

一位毕业于英国Lancaster大学的修辞学博士顾日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曾经指出，在郑子瑜之前，国际上撰写一国修辞学全史的甚为罕见，只有美国学者肯尼迪写

了一本希腊修辞学史，但仅仅写到18世纪为止；而郑子瑜皇皇50万言的《中国修辞学史》却是从中华文明的起点开始，一直写到当代，是一部真正的国别修辞学通史。

当然，在笔者视野中的“大家的大家”，还有更深一层涵义，可理解为“民众的大家”。作为“民众的大家”的郑子瑜，除学术贡献外，试读其作于20世纪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刻的诗文，可领略其民族喉舌的文采。

要认识郑子瑜，走近郑子瑜，似乎难以遵循惯例，仅从他的学术论著来评鹭他。因为郑子瑜的治学道路和人生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尤其是他的苦学奋斗、孤军上阵的学术道路，与中国当代众多学院派学者治学经历迥然有异。笔者在走近郑子瑜的过程中，花费了许多精力来弄清他罕见的艰难的治学道路以及他所取得的成果，其中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他的艰辛卓越的人生经历。

二

1916年3月18日，郑子瑜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一个破落的读书人家。郑氏原为闽南大姓，是中国历史上“系出荥阳，家传诗教”的赫赫望族，其先祖郑开禧又是闽中名儒，所著《知守斋诗文集》为闽省历史名著。可是在郑子瑜降生之年，郑家已经破落到难以为生的窘境。祖宗祠堂的传统楹联已由“听尚书之履，声响蓬莱；出通德之门，辉联阙闕”而悲剧性地变为“祖宗非积德，世世吃断菜根，种下这读书种子”（仅记得其上联）。自从郑子瑜呱呱坠地以来，命运便有意地捉弄他，贫穷与饥饿伴随着他的童年而至少年。他的父亲是颇有旧学根柢的小知识分子，他以自

己转型年代无法为生的教训来开导其子女，希望他们不要延续自己的人生悲剧，要尽早学一门手艺，谋个职业以解决温饱。但是，郑子瑜自幼便嗜学如命，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子瑜的兄弟们皆病痾缠身，无钱找医生而早夭。贫困的肆虐给郑子瑜的幼小心灵和身体带来巨大的磨难，他因营养不良而致身体孱弱。他5岁进入龙溪县立第二小学，没有足够的钱购课本，只得向富家子弟借课本抄写。这种长期超负荷的笔耕，竟养成他挚爱写作的习惯。我曾于1995年5月下旬在上海拜谒过郑子瑜，当时他正出席复旦大学90周年校庆。在短暂的不足一小时的会见中，发觉他老是低头行步，问其所以然，原来是幼年缺少起码的学习用品，无奈之余只得常常低首在操场上踱方步，希冀拾得他人扔下的铅笔头以满足求学的需要。被这种侥幸企望所驱使，他养成了低头步行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无论坐、卧、起立、行走，他总是好像在寻觅什么。

有一年春天，郑子瑜因贫穷难捱遂在漳州求乞，受尽凌辱。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饱尝各种滋味。在行乞途中，他曾赋诗一绝：“叫乞东门事偶然，闲来且咏相羊篇。慈仁里巷无仁者，只掷泥沙不掷钱！”诗前小序云：“岁首无事，乞食漳城，三日两餐，无为怜者。”

郑子瑜的学术研究正是在如此苦难艰辛的生存环境中萌芽和进行的。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傲骨也愈会变得刚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辛足以锻铸栋梁之材，这是施加暴虐于人者所无法理解的。郁达夫在1936年赴日本邀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大计，于1937年元旦经台湾西渡厦门时曾面晤郑子瑜，勉励他“我辈生于乱世，只能挺着坚硬的穷骨，为社会谋寸分进步耳”，这给谋生无着、

求职不成的郑子瑜很大的鼓舞，也许是这一契机，使郑氏由挚爱郁诗发展到研究郁诗，成为“研究郁达夫诗词的第一人”（见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侧影》）。

弱冠之年的郑子瑜，由于贫困，不得不彷徨于漳州、厦门街头，同时开始了文学和学术活动，创办《涟漪》文艺月刊和《九流》文史月刊。他又响应当时文化界的“大众语”运动，撰写了不少杂文、散文。更与文友们衔觞赋诗，行吟泽畔，大有屈子风范。

厦门沦陷后，郑子瑜为了逃生不得不于1939年南渡到北婆罗洲的首府山打根，开始了漫长至今的域外生活。应该说，他真正的学术生涯是在南洋时以一介农夫劳作之余而开始的，在抗日烽火燃遍南洋时，出于对民族之魂鲁迅的崇敬，他完成了筚路蓝缕的《鲁迅诗话》和鲁迅研究领域借用传统笺注技法来阐述其深刻意蕴的《〈阿Q正传〉郑笺》。

初来地瘠人虚的山打根，独处异域，乡愁难解，郑子瑜撰写了大量的回肠荡气之作，抒发了“日日乡愁非易遣，奈何飘泊不思归”的离情别绪。令人惊讶的是，弱冠之年又名不见经传的青年郑子瑜，其诗作竟为当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所喜爱。于氏读了他发表于报端的短章《移寓白沙湾》“向晚渔舟逐水流，前村微雨后村秋。近来偏爱依山住，为乞青山伴我愁”之后，竟爱不释手，写成条幅，寄给万里外素不相识的郑子瑜。于氏是南社健将、书坛圣手，他的政治地位之重和艺术造诣之高为常人莫及，竟如此看重郑氏的诗作，可见他对郑氏诗爱之真切。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当时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与郑子瑜诗书的交谊上，兹不赘述。

在南洋时期，郑子瑜创作了多篇以为民族捐躯的华人

抗日英雄为主题的“实录”散文，以生动逼真、神妙入微的笔触，将惊天地、泣鬼神的华侨先烈与日寇相搏斗、慷慨赴难的大无畏精神，以如椽巨笔浓墨重彩地加以描绘，反映了郑子瑜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念、处穷迫之境而有献身之志的美德，文笔雄健，才气横溢，虽一生蹭蹬而雄心未改，为民族之新生放胆呐喊。这种精神，一旦用之于学术，使郑子瑜之学术内容充满着经世之精神。读这些曾入选大陆、台湾、香港等地中学课本或课外读物的汉语范文，我们可以看出郑氏文章摆脱了欧式笔法，以纯净的汉语、简洁的句法来叙事状物，吸收汉语中有益的养分来熔铸新词，这也正是他学无师承而又转益多师的学术生涯在创作上的反映。郑子瑜后来以修辞学家闻名于世，也许正是他早年从事创作的一种理性探索之结果吧。郑子瑜的友好、已故文史学者罗香林曾从另一角度来评述包括《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在内的郑子瑜的文章，谓“足以补现代史之未备”。是的，除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外，郑氏在抗战年代所写的诗文，是研究抗战史、海外华人史乃至马华文学的弥足珍贵的“史料”。

三

我在不断走近郑子瑜的过程中，对两件郑氏轶事极有兴趣，可以说，这两件事不但鲜为人知，而且更能从中显现出郑子瑜的人格风范。

其一是1939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投降派气焰极为嚣张。郑子瑜以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的勇气，上书国民参政会，力主为

民族罪人汪精卫铸一铜像，跪于中山陵前，让其如千古罪人秦桧一样遗臭万年。此事当时各通讯社竞相报道。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郑子瑜旧友黄典诚曾以《金缕曲》一词记其事，上阕说：“万里时牵家国念，恨奸人，竟把中华卖。倡为偶，跪如桧。”笔者阅读了许多叙述抗战时期华侨们义无反顾地支援祖国反抗日寇侵略的文章，无不提及陈嘉庚著名的30字提案，即“日寇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概以汉奸国贼论”，誉之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殊不知，作为在野之民的郑子瑜，其提案亦足以与陈氏提案相媲美。

另一件事是抗战在最艰苦的年月，郑子瑜曾创作了许多歌词，均为号召南洋华侨青年奋起抵抗而作，并将多首抗战歌词寄给当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郭氏为请作曲家谱曲，刊于《华侨动员》半月刊，寄发南洋各地侨团。我曾在撰写《郑子瑜的抗战诗文》时，搜集到他的《华侨新青年》、《华侨总动员》等数首歌词，告诉郑先生，想不到他已对这五十多年前的作品淡忘了，至今海内外出版的郑著，都未曾收录。是的，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出于对民族之挚情，只有奉献不求索取。当全民族通过浴血奋战，取得近代以降首次抵抗强敌入侵的巨大胜利之后，他又悄悄地回到书斋，回到为稻粱谋的非学术性机构，延续他那艰辛苦斗的人生。巨大的民族胜利他仅从精神上得到安慰，不企求在物质上捞到好处，而对民族自尊自信的一股力量，又激励他在学术上做出新的贡献。也许这正是华夏民族知识分子所服膺并遵循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节操。

不久以前，我读到了郑子瑜的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1995年10月22日的一篇短文，其中说道，“华夏民族虽不只一次受到异族的侵袭，近世且不断地受到帝国主义者在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侵略，但全民还是自强不息，前仆后继，终于能屹立于世，不为所动者，主要是由于华夏有五千年的文化，决无甘居人下之理”。纵观今日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民族内部弥漫着的一种自卑情绪，由此而衍生出及时享乐、声色犬马的灰色氛围，拜金主义和为一己之私利而忘却民族大义，即使是知识阶层也未能幸免。这是最令人惋惜的。

1954年，郑子瑜开始定居新加坡。在这个小岛上，他一直没有机会在心仪的学术机构任职，不断地遭到不太懂得汉文的所谓西洋“汉学家”的歧视和白眼。“决无甘居人下之理”，整个民族如是，作为民族单个细胞的个体也如是。这给郑子瑜的苦学带来更加奋发的动力。学术是不为国界所囿的，是人类之公器，他自强不息，藐视歧见，以超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出版了《入境庐丛考》（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主编了《南洋学报·黄遵宪研究专号》，这是汉学界第一本黄遵宪研究专论和第一册黄遵宪研究的专刊，使郑子瑜首倡的黄遵宪研究——“黄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并为国际“黄学”同仁所认可。郑子瑜的“黄学”成果使他具备了迈向国际讲坛的实力。

郑子瑜一生的转折点由于他不断的奋斗很快便来临了。他与日本汉学界铃木虎雄、实藤惠秀、铃木由次郎、增田涉等四位著名的学者取得了联系。异域友人慧眼识珠，他们极佩服郑子瑜的学术功力和对“黄学”的研究成果。实藤惠秀曾回忆初读《入境庐丛考》时的欣喜之情，“拜读

之下，我很欢喜，欢喜在外国还有人黄遵宪的研究发生兴趣，使我觉得吾道不孤，从此我们便常常通信，后来周作人又来信介绍，于是我报告郑先生《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手稿》发现之经过，并邀请他来我国，共同研究”。

1962年郑子瑜首次赴日本讲学，取得巨大的成功。1964年又被早稻田大学聘请为教授，且为六名日籍教授开设“中国修辞学特殊讲座”，成为世界著名大学的教授之教授，这是华裔学者首次在日本著名大学获得的殊荣。

四

大陆学人如我平庸者，一般来说治一门学问之外很少旁及其他，而郑氏的学术研究起码包括中国修辞学史、黄学、现代文学，又旁涉儒学，在大陆学人的眼光中是横跨几个学科，非博学者所能到。好在如题目所示，我讨论的是“大家的大家”，也即是讨论郑子瑜学术能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地方，于是不揣浅陋作些试评。

郑子瑜曾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奉为治学八字真经，他曾对笔者说：“我一生写学术论文，立志要有创见”，“我一生受尽凌辱，所以养成不畏权威的勇气。”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品格，是一种怀疑求真的科学精神。

在郑子瑜的眼中，郁达夫的旧诗“受宋人影响最深，这可能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与宋朝有若干相似之处”，此为独树一帜之议。郑子瑜以其渊博的文化素养，将郁诗中出自宋诗的章句一一钩出并加以微观比较，令治现代文学者耳目为之一新。

在《人境庐丛考》中，郑子瑜针对大陆部分学者认为

黄遵宪早年诗作中存在着仇视太平天国起义军和义和团的思想而反对给予“爱国诗人”称号的观点，引证了1903年黄氏致梁启超函中评论曾国藩的话，说明黄氏后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已由仇视转为同情，这一认识使“黄公度实足以当得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而无愧”。

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均误解此诗寄寓所在。郑子瑜指出，“此诗实藉莲菊桃杂供一瓶，以喻新加坡各族杂处，应该谊若一家，不应互相猜忌，而想锄去他族”，他又进一步阐明该诗隐含异族通婚之见解，将黄遵宪思想中隐含的“大同”观发掘出来，实为石破天惊的新颖之见。“大同”观也是郑子瑜所倡导的一种南洋群岛所占比例甚大的华人如何与其他各族和睦共处的良方。早在1959年，郑子瑜在新加坡广播电台作“学术讲座”，以“利人主义的墨子思想”为题，借助先秦诸子中有益的思想养分，力倡在南洋的华人应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

一般的意见，以为文化的交流，学术思想的互相介绍，是促进各族互相了解的最好的办法。华人定居马来亚，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与马来亚各族结了解之缘，无疑的，中国学术思想中一些好的、能激发人向上的、鼓励人和平共处的，将会渐渐地被吸进马来亚文化的范畴中。

这种国际性的学术眼光，已一扫自大的大国沙文主义，具有极高的警示作用。

陈望道是郑子瑜崇敬的学者。郑子瑜称誉“真正不顾

复古派的对抗，采用由西方传入的科学方法，彻底将中国的辞修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功夫，写成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但是，郑子瑜也指出《修辞学发凡》中的一些疵误，如陈氏以为要使话语文章的伦次通顺，应该顾及上下文，使之相衔接和有照应，认为《礼记·玉藻》中“大夫不得造车马”，《易·系辞》中“润之以风雨”等句伦次欠通顺，指出“谁曾见马可造，风会润？”郑氏指正说，这是偏义复词的应用，用“车马”仅取“车”义等。

在《中国修辞学史》中，这种求疑存真、阐述新意之处俯拾皆是，如指出宋代陈骙《文则》是中国首部论文的修辞法专著，明代谢榛《四溟诗话》是首部论诗的修辞法专著，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宗经篇》是中国文化史上首次将“修辞”二字连用，又确是指Khetoric而说的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在汉语圈中，第一次构筑了与文学史、哲学史等显学并肩而立的中国修辞学史的辉煌的学术大厦，是一次真正前无古人的创始性的工程。

我十分注重郑子瑜另一部巨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中的自序，开篇即说：

余向不以成败论英雄。余之心目中居高位者未必贤于其从属，盖其位置往往可以侥幸而得之也……是故居高位者不必高自位置，从辟书为僚属者又何必自卑，而人亦未可渺视之也。

这实际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在野精神在学术上的反映，